

试论中国侨乡发展的分期及其形态变化

张国雄

(五邑大学 侨乡文化研究院, 广东 江门 529020)

摘要: 发展分期是中国侨乡研究领域最基本的学术问题之一, 是学科建设的基础, 学术界讨论很少, 亟待深入探究。中国侨乡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 经历了形成、初步发展、成熟发展、转型发展、全面发展5个时期, 蕴含着近代侨乡、现代侨乡和当代侨乡三种文化形态。

关键词: 侨乡; 广东; 分期; 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34; K29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13(2023)01-0001-07

中国侨乡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以后^[1], 经历了独特历史进程, 至今还不是侨乡研究领域重点讨论的问题。然而, 它却是中国侨乡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最基本的学术问题之一。为侨乡研究建立一个时间框架, 有利于更好揭示侨乡发生发展的原因机制, 有利于描述侨乡形态的阶段性演变, 有利于把握中国侨乡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更对考察当今侨乡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世纪以来, 中国的侨乡研究已经广泛展开, 为准确认识侨乡发展历程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也对这一基本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产生了必要性和迫切性。本文以广东侨乡为分析对象, 对中国侨乡发展的分期进行研讨, 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侨乡发展分期的原则

分期是中国侨乡研究的一种历史方法, 帮助我们以原始资料为基础, 透过纷繁复杂的内外要素, 看到中国侨乡有规律的演变过程, 揭示中国侨乡发展的整体性、阶段性和连续性。因此, 它的运用带有分析者的视角和时代性, 必然按照一定的原则去梳理发展脉络, 这是中国侨乡发展分期的基本前提。

中国侨乡发展分期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对此, 学界没有专门的讨论, 笔者拟通过学术回顾提出己见。

最早对中国侨乡发展进行分期的是黄重言。他于1982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侨乡社会的历史和侨乡调查》, 对侨乡分期进行了最初的讨论。其观点前后有变化, 后文将中国侨乡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19世纪末形成时期、辛亥革命到1949年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1949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78年以来飞越发展时期。^[2]1998年方雄普发表的《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将侨乡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840年至辛亥革命前形成期、1912年至1937年发展期、1937年至1949年破坏期、1949年至1966年转轨期、1966年至1976年停滞期、1976年后繁荣期。^[3]2009年澳门学者郑德华将中国侨乡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为孕育和形成阶段, 1912年到1937年为发展阶段, 1937年到1945年为停止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为转变阶段, 1978年至今为新发展阶段。^[4]

新世纪以来, 各大侨乡研究也对分期有所关注。在广东侨乡方面, 梅伟强、张国雄将五邑侨乡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唐宋元孕育期、明清发展期、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高潮期、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成熟期。^[5]在福建侨乡方面, 俞云平、王付兵提出鸦片战争后、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的时

收稿日期: 2022-09-2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广东侨乡的形成与发展”(批准号: GD13TW01-2)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国雄(1955—), 男, 江苏宜兴人, 五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博士、教授, 主要从事侨乡文化、华侨历史、世界遗产研究。

段分期。^[6]蔡苏龙参照了方雄普的分期将泉州侨乡发展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和定型期,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发展期,1937年至1949年破坏期,1949年到1976年转轨停滞期,1976年改革开放繁荣期。^[7]在广西侨乡方面,赵和曼认为,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为形成阶段,20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为初步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为中断与恢复期,新中国成立后为快速发展期。^[8]

深入观察归纳上述境内外学者对中国侨乡发展分期的论述,不难看出都是围绕着“侨乡的形成”和“侨乡的发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隐含着“何以为侨乡”、“侨乡演变的因果机制”问题意识,注意动态地把握“过程”,对“过程”推进的阶段划分交织着三条论述主线:首先是华侨的变化,集中在移民规模和反馈家乡两个方面;其次是中国政局的变动,集中在外交、侨务政策和政局巨变;第三是世界格局的改变,集中在对华关系和世界变局。三条主线构建了侨乡的演变机制,华侨是机制的具体构建者、实践者,而且华侨也是侨乡形成、发展的特征。在三条主线的推进论述中,都选择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重点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等中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节点,以表示中国侨乡发展的阶段性质变,因此相关的分期大同小异。

回顾中国侨乡分期的学术论述,上述探索很有价值,构建了一个时间框架,为侨乡研究提供了平台。不足之处在于,三条主线集中关注了海外和国家层面,忽视了侨乡本土,侨乡民众基本没有声音,仿佛是被动的沉默的接受者;三条主线反映的动因缺乏主次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合理性缺乏深入的讨论。这些不足,直接影响到分期研究的学术深度和意义。

笔者以为,中国侨乡分期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世界视野。侨乡的形成从初始就是中外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最初的变因。从近代至今,其发展绝非局限于国内,而与世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动能多元。因此,中外关系、世界政局的重大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到侨乡的发展。海外侨胞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再到溯源寻根,^①他们与侨乡的互动方式和动能转换对侨乡的发展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第二个原则是核心主线。如果说华侨华人的现实生存空间是在世界各地,其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那么侨乡则扎根于中华大地,侨乡史

属于中国史的范畴。^[9]侨乡形态非独立于国家形态,首先是中国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外来文化是侨乡形成发展的重大变因,侨乡形态转变最根本最深层的制约因素仍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发挥作用。1912年、1949年、1978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对侨乡的影响至大至深,是主导因素,侨乡与国家关系的互动应当成为侨乡分期的核心主线。侨乡民众更是侨乡形成、发展的实践主体,海外侨胞的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都要通过他们的具体行为去形塑侨乡的经济、社会、文化面貌。

第三个原则是变与不变。“变”是中国侨乡发展的一个基本特性,因而呈现出阶段性。其阶段的合理性在于与前后过程的质差,如果划分出的阶段是交叉的、重合的,就严重影响对其发展规律的把握。因此关注“变”重在合理性。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形态,^[1]近代以来中国侨乡一直保持着与非侨乡地区不同的基本特征,不仅没有消失,还在不断加强,使中国侨乡发展保持着整体性、连续性。

保持三条主线的考察,以中国为主,关注侨乡民众的反映,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将“侨乡的形成”和“侨乡的发展”两大基本问题,通过侨乡“实体”的出现、侨乡“观念”的形成、侨乡“认同”的建构进行论述,^[10]将是本文的分析逻辑。

二、中国侨乡发展的分期

按照上述分析逻辑,我们将中国侨乡发展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一) 质变形成期(19世纪60—70年代)

中国侨乡的形成是一个突变的过程,长期的海外移民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移民规模的迅速扩大,积累的量变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商民私自出洋禁令的实际废止,引发质变,^[1]侨乡“实体”随之形成显现。光绪年间新宁(今台山)县令李道平在其《宁阳存牍》中记载:“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犹斗靡奢华,风气大变。”^[11]开平县,“至光绪初年,……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未知与道、咸间相去几何也。”^[12]台山、开平两县两邻,乡村建筑、饮食、婚俗、民风皆因“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而“大变”,民众接受“洋风”表现出新的生活样态,这些带给

地方主官和乡村士绅极大的心理和视觉冲击。

（二）初步发展期（19世纪末到1911年）

晚清的30多年是中国侨乡“实体”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广东潮汕、五邑、梅州的出洋人数继续增加，其分布从东南亚扩展到美洲、大洋洲。“父携其子，兄挈其弟，几于无家无之，甚或一家而十数人者有矣。”^[13]¹³⁴“潮民之出洋者，人皆称为番客。二三十年前，‘番客’二字，为极不美之名词，今则奉为至尊至荣之徽号矣。”^[14]海外移民规模的扩大，为侨乡持续带来侨汇资源。“近年以来，号称‘小康’不至竟成困竭者，全恃出洋寄归之款为之挹注。”^[13]¹³⁴广东侨乡由俭而入奢的民风民俗变化更加突出，公益慈善事业推广，“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15]侨乡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态度转圜，“咸同以前，视异教如仇敌，有入教者目为异类，至鄙之不齿与人数。光绪纪元以后，……教堂遍邑中矣。”^[13]¹³¹西方的宪政民权理念也引入侨乡，“同光以来，欧化输入，华风嘘出。于五洲宪国之权利，宪民之义务，颇有见闻。可谓本境之所易而韶雄之所难。”^[13]⁴²侨乡“实体”的“面”和“质”以及与非侨乡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厚实鲜明。

（三）成熟发展期（1912年到1949年）

“侨乡”概念在此时期的出现^[1]，标志着侨乡“观念”在本土民众中形成，构建起“认同感”“归属感”，近代侨乡形态完全成熟。这一时期的中国侨乡发展又经历了3个阶段，总体上从中外文化交汇区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融区，对确立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辛亥革命后快速发展

侨乡移民在海外的拼搏奋斗中，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贫弱至深，个人权益得不到来自国家的保护。即便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华商，也是“没有帝国的商人”。^[16]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强大国家是他们迫切的心愿，“中华民族”意识逐渐凝聚起侨心，华侨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华侨与侨乡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华侨新村到潮汕铁路、新宁铁路先后兴建，从大力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到兴办侨乡企业，从投资中小学、医院、图书馆到创办侨刊乡讯营造侨乡舆情氛围，华侨对家乡的投资热情从家庭扩大到侨乡社会，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六记载：“都市大企业

及公益交通事业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有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1889年到1949年的60年间，华侨在潮汕地区投资兴办的工业、商业、农矿业、服务业、交通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企业共4062家，其中1920年到1937年的18年间兴办2157家，形成了城乡商业网络。^[17]1833座开平碉楼中有1490座也兴建于这个时期。^[18]中西合璧的乡村建筑成为中国侨乡的重要地标。

家庭、家乡与国家一体的家国意识日益深入侨乡民心。五邑侨乡开平立园泮立楼四楼神龛的“宗功伟大兴民族，祖德丰隆护国家”对联，就宣示了华侨与侨乡民众的家族、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先后以加拿大华侨和美国华侨为主的台山海内外乡亲投资兴办台山县立第一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这是台山侨界、港澳同胞和侨眷第一次打破房界、族界、地域界限，齐心协力共同捐资办校的创举。^[19]这些都是侨乡认同、归属的文化基础和逐渐构建的标志。

2. 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停滞

1931年“9.18事变”爆发至1945年的14年间，对中国侨乡发展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后的7年，尤其是1941年日军侵入东南亚、占领香港、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后的4年。在此期间，侨乡与海外关系几乎中断，侨乡发展态势急降，严重依赖侨汇为生的侨眷家庭无不陷入生活的困境，很多侨眷家庭分崩离析；各项建设停滞，经济下滑，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口锐减。台山县在1941年到1945年间经历了5次沦陷和3次严重的饥荒，根据1946年的统计，抗战期间台山因饥饿等非正常因素死亡的人口达到14万多，^[20]¹⁷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侨乡发展陷入无心、无力、无资源的境地。

3. 抗战胜利后恢复重建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侨乡与海外的联系全面恢复。随着美国、加拿大等国《排华法》的废除，以及《战争新娘法》《外籍未婚夫与未婚妻法》《美国公民华籍妻子法》等新移民法的相继颁布，引发侨乡向海外的移民新高潮，因婚移民美国在五邑侨乡非常突出。流入侨乡的侨汇急剧增长，1946年1月，通过台城中国银行的侨汇就有425万美元，全年达到1420万美元，^[20]¹⁷⁷当年台山只有77万多人，^②人均达到18.2万美元的离奇水平，代

表了战后侨汇收入爆炸性恢复增长的特点。1946年到1949年,华侨在潮汕地区投资兴建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企业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0%多,^{[17]587-590}是1889年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如果考虑到这是战后仅仅4年的情况,更可见侨乡恢复重建的势头是多么的强劲。五邑侨乡恢复重建在人员往来、侨汇体系、海外婚姻等方面同样有突出的表现和成效。^③同时,必须指出,这个阶段的恢复重建时间很短暂,紧随而来的是国民政府金融体系崩溃,侨乡的一些经济重建项目陷入极度的困难,比如新宁铁路的重建被迫停在纸面上。即便如此,1946年、1947年“侨乡”概念出现在侨刊乡讯之中,^[1]它是中国侨乡形态完全成熟、侨乡民众文化认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四) 转型发展期(1949年到1978年)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发展开天辟地的变革,中国侨乡完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侨乡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

1. 侨乡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根本转变

近代侨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是聚族而居,延续着千年来的家族自组织形式,村与家族合一为治理单位,基层社会治理还是宗法自治模式。虽然1949年前,华侨在侨刊乡讯中屡屡发文抨击宗法制度和宗法势力对乡村的控制,在侨乡新农村建设中引入西方的民主治理理念,设计了重大事项集体讨论民主决策的制度,提升了每户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发言权,努力推动传统宗法治理模式的转变;但是,并没有彻底消除宗法势力对宗法制度的维护,宗法组织依然存在,在华侨新村自治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以宗法为中心的士绅势力还是国家县级以下治理体系的主要依靠力量。

1951年开始土地改革运动,随后进行农村合作化改造,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彻底打破了乡村的土地关系,宗法制度解体。土改期间,五邑侨乡台山县有21661户侨眷家庭、67971人分得土地、耕牛,占该县侨户数和侨眷人数的55%。^{[21]156}1956年3月,广东省召开的第一次侨务工作扩大会议制定了吸引归侨、侨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措施,台山县当年就有3万多户入社,占全体侨户的91%。1957年发展到96%侨户入社。^{[20]178}1956年潮阳县侨眷农户共32400多户,参加农业社的就有31500多户,占总数的97%。潮安县29个乡参加农业社的侨眷农户占比达到96.3%。^{[21]173-174}侨村的土地关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根本变化,族姓势力在基层组织结构中的权力基础被打破,士绅权力组织被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治理体系彻底取代,政府行政管理直接深入到村,家族中的贫苦农民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近代侨乡社会受宗法组织控制的侨乡农户、特殊的侨眷阶层被纳入到新政权的组织网络之中,乡村政治生活发生根本性转变。

2. 侨乡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根本转变

近代侨乡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输血依赖型模式,“衣焉食焉及一切日用器具,无不籍资于外来”,^[22]侨汇是侨眷家庭的命根,也是侨乡发展的主要依赖。在民国时期侨乡有识之士一直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尤其是1941年底与海外联系中断,侨乡发展受到重创,促使他们战后疾呼,必须改变依赖型侨乡发展模式。然而直到1949年这种反思也没能改变侨乡民众对侨汇的输血依赖。1949年《台山至孝笃亲月刊》第14期登载的《严防悲剧的重演》一文,足见有识之士对这种模式的痛心疾首:

台山本就是一个粮食不足的县份,过去因为靠了华侨的众多和外汇的大量涌进,令到农村崩溃和造成社会畸形的发展,养成邑人奢侈繁荣的陋习和倚赖外洋的心理,对于怎样增加生产,从来没有人加以注意。所以到了抗战期间,外汇断绝,台山人便遭受了空前的厄运。当时那种卖妻鬻子,饿殍遍野,死亡无算惨绝人寰的状况,相信到现在还深深印在邑人的脑海中的。可是胜利以后,因为华侨的大量回国和外汇的增进,又把那些血淋淋的惨痛冲淡了,……战前那种奢侈繁华之风,变本加厉的在本邑中蔓延着。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社会革命,将侨户组织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大力批判依赖侨汇的错误思想,使有劳动能力的侨眷逐步转变了依赖侨汇生活的观念和方式,加入合作社,参与农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劳动,县域农业经济被组织起来。有识之士呼吁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农耕生产,改变外购内销经济结构的心愿,终于在新中国得以实现。台山县广海东南农业合作社由46户侨眷组成,拥有500多亩耕地和72个劳动力,他们一改过去的依赖思想和习惯,积极参加农业劳动,掌握生产技能,粮食年年增产,闻名全国。^{[20]178}历史上缺粮的台山县,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近代侨乡的输血依赖型发展模式向内生型发展模式发生根本的转变。

3. 华侨参与侨乡事务的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在近代侨乡社会，华侨有着强烈的“侨乡共同体意识”，他们通过往返家乡、家庭书信、各种侨团以及侨刊乡讯等渠道和方式，参与到侨乡工商业、城镇建设、文教卫生以及村落事务等发展之中。侨乡是他们的家乡，他们自认为从来没有“离场”，一直“在场”参与着侨乡方方面面的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发生根本转变；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以及大量华侨的人生安排从过去的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侨乡成为他们的祖国等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华侨华人与侨乡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乃至资金流客观上受到影响。华侨与侨乡的联系，从近代侨乡的网络状态转变为比较单一的家庭信、银（侨汇）往来以及少量的回国探亲和告老还乡，对家庭之外的侨乡事务的参与相应减少。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侨乡的这三个根本转变，推动并突出了侨乡发展与全国广大非侨乡地区“同质”建设的一面。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根本转变并没有使中国侨乡失去“侨”的特质。近代以来形成的海内海外两个群体、侨乡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侨眷与非侨眷的特殊结构、侨汇经济以及文化观念等等，依然对侨乡发展产生着持续的重要影响。华侨华人与侨乡的联系依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广受政府的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制订了优待华侨投资的办法，努力吸引侨资参与经济建设。台山县1952年到1960年吸引华侨投资的建设项目就有蛮陂头水电厂、三合糖厂、华侨自来水厂、华侨粮食加工厂等。^{[21]157}1953年汕头市31个同业公会的2768家商户中，有224家商户有华侨投资、借贷和存款，总投资额324.73万元，占全市工商业资本总额的19.25%。^{[21]176}我们还需要看到，50年代主要在传统侨乡地区安置难侨归侨陆续兴建的华侨农场，归难侨成为侨乡发展的新动力，这是对现代侨乡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扩展，也加强了侨乡的特质。这些都继续维护着中国侨乡的历史惯性，持续表现出与非侨乡地区的区别，中国侨乡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实现了转型发展。

（五）全面发展期（1978年至今）

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序幕，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随之而改变。走进全球化的当代中国带给侨乡新的发展机遇，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中国侨乡的发展更深地嵌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被赋予新的发展使

命，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有了新的国家定位，进入到一个不同于近代侨乡、现代侨乡发展的新阶段。

广东、福建传统侨乡自近代以来拥有的发展资源、渠道和方式等“侨乡”特质，随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凸显出当代价值，浙江及闽东等新侨乡的快速扩张扩大了侨乡的地域版图，^④中心城市侨资源的快速增加赋予城市侨务工作新的空间，^⑤侨乡资源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资源。从1978年到2017年，广东引进的外资中70%是侨资，60%多的外资企业也是侨资企业。^⑥五邑侨乡台山县1979年到1987年实际利用外资、侨资2145.22万美元，同时期恩平县实际利用外资、侨资3864万美元。^{[21]158}汕头市截止1987年底，全市侨眷、归侨和港澳同胞家属在海外和港澳乡亲的资助下，兴办个体和集体企业7847家，吸收从业人员12万人。^{[21]173-174}文教卫公益事业捐助达到新的高潮，超过了近代侨乡的规模和水平。仅台山县1979年到1986年就有368所中小学接受了45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台山县图书馆、台山少年宫、台山科学技术馆、正贤体育训练馆、台山县教育电视台、台山华侨博物馆等一批大型文化基础设施得以兴建。^{[21]159}潮汕侨乡1978年到1987年接受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款达到5.71亿人民币，^{[21]175}中小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公益事业大受助益。广东侨乡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广东、福建侨乡的海外资源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并投资广州乃至内地城市经济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角，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其本质要求。当代侨乡发展对标国家战略的意义和地位也因此更加突显，其肩负的国家战略使命和责任远远超出了近代侨乡、现代侨乡。习近平总书记2010年提出“根”“魂”“梦”的重要侨务论述，侨乡的山山水水、地域文化和中外融合的侨乡文化，就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共同的“魂”的具象物，将侨乡建设成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必然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因此侨乡发展具有国家重要的战略意义。2014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实验区”，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支持在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

要平台”，这些都是新时代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对侨乡发展的国家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是侨乡资源上升为国家发展重要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的表现。对当代侨乡角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从传统的经济视域更广泛地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从对内的重要意义扩展到内外兼顾的价值，因此当代侨乡具有了与近代侨乡、现代侨乡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中国侨乡正在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时期前行。

三、中国侨乡的形态变化

上述五个时期反映的侨乡形成与发展，从侨乡与国家互动关系的核心主线考察，可以表现为近代侨乡、现代侨乡和当代侨乡三种形态。^⑦

近代侨乡包含形成、初步发展、成熟发展三个时期，经历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呈现出与非侨乡地区有鲜明区别的文化特质。这主要表现为侨眷与海外移民众多，华侨全面参与侨乡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各种血缘、地缘、业缘侨团与侨乡的联系形成紧密网络，是侨乡发展的重要动能；侨乡民众对世界有较多的认知，“金山”“南洋”与侨乡是一个交融的整体，“番畔钱银唐山福”，其生活方式受到更多的世界变化影响，他们生活在“侨乡”与“世界”融合的文化空间中；各种中西合璧的乡村近代建筑成为侨乡鲜明的文化景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文化卫生发达；侨乡意识形态既传统又开放，观念混杂，乡村治理结合了宗族和外来的理念机制；侨汇成为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资源，推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侨乡的关注，侨务工作因此成为国家新的治理事项；广东、福建、海南沿海地区从历史上中国的“边缘”地带转变为“前沿”地区，是近代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展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窗口，在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中得领风气之先。这三个时期的文化面貌，是侨乡“实体”、侨乡“概念”、侨乡“认同”的基础和具象，贯穿其间的根本相同之处在于传统乡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因此构成了侨乡近代形态。

1949年新中国建立，侨乡发展的国内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6月司徒美堂在政协全国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发言稿中使用了“广东侨乡”、“四邑和中山等侨乡”的提法，^[23]“侨乡”进入国家话语体系，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在继续保持海外侨胞、侨眷众

多和侨汇量大这一侨务“特质”的同时，经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侨乡原有的社会结构被颠覆，国家控制效能直达基层，宗族自治成为历史；二战后尤其是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落地生根成为华侨面临的重要选择，华侨社会也发生重大转变，海外力量投资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受到重视，而对侨乡社会事务的参与面和参与度大大减弱；侨汇不再具有支配经济生活的地位和作用，侨乡输血型经济发展模式根本转变，自力更生方式取代了传统依赖性生活方式；侨乡与非侨乡地区的“同质”发展得到极大的推进。总之，经过1949年后的转型发展，侨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与近代国家有限控制不同的现代形态。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并逐渐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加需要了解世界，也需要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侨乡拥有的海内外“侨”资源就彰显出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共创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国家战略；侨乡遗产资源对6000万海外侨胞固“根”、筑“魂”、圆“梦”有着特殊的作用，将侨乡建设成侨胞的精神家园也赋予侨乡乡村振兴更高的国家站位。于是，中国侨乡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提升。新移民的大规模出现，增强了江门五邑等传统侨乡与海外的联系，浙江等新侨大省推动新侨乡扩展和丰富。改革开放之初的四大经济特区分布在广东、福建传统侨乡，广大侨乡成为接受侨资、外资的重地，最早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全国领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侨乡近现代遗产的价值和世界意义日益契合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需求，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等国际文化形式，展示给全球，得到全人类的认同。当代中国侨乡延续着现代侨乡融入国家体系的惯性，从侧重经济意义的侨乡社会向更加突出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全面发展的侨乡社会扩展，在更高的层面发挥着它与世界紧密联系的独特作用，是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桥梁和渠道，中国侨乡转型为当代形态。

中国侨乡三种形态的转化演变，相互之间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侨乡特质不断加强，“认同感”、“归属感”不断建构，具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同时，其不断融入国家体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又表现出具有质差的阶段性，其资源禀赋从“侨乡”

走向“国家”，逐渐显现出世界性；其发展地位从“地域”走向“全局”，逐渐纳入“国家战略”。近代、现代、当代三种侨乡形态的划分也揭示出中国侨乡分期的规律性。

注释：

- ① “溯源寻根”是李明欢在国务院侨办国内司2019年3月于江门召开的“侨乡文化理论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述。
- ② 1947年2月出版的《莘村族刊》第2期报道：“现有人口计男四十二万二千二百九十四人，女三十五万四千零十二人，合共七十七万七千三百零六人。”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87。
- ③ 石坚平从侨汇、婚姻等角度对五邑侨乡战后的恢复重建进行了多角度论述，提出了“重建”的概念。参见石坚平：《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4期；《战后广东四邑侨汇体系的恢复与重建》，《五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战后四邑侨乡社会权利体系的恢复和重建》，《八桂月刊》2019年1期。
- ④ 周望森：《浙江华侨史》，第八章第一节指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浙江海外移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大批侨乡在浙江各地涌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
- ⑤ 随着中心城市留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增加以及华侨华人科技人才进入中心城市创业发展，张应龙提出“都市侨乡”的研究命题。参见其《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新命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⑥ 本数据来自广东华侨华人博物馆华侨历史展览内容。
- ⑦ 郑德华最早提出将侨乡分为“近代侨乡”“当代侨乡”的学术观点。另外，郑德华认为传统侨乡与当代侨乡的分界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见郑德华：《关于“侨乡”概念及其研究的再探讨》。

参考文献：

- [1] 再琰杰，张国雄. 地域视野下的侨乡文化——以广东侨乡为例[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6): 131-139.
- [2] 黄重言. 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M]//郑民, 梁初鸣. 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9.
- [3] 方雄普. 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M]//庄国土. 中国侨乡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 [4] 郑德华. 关于“侨乡”概念及其研究的再探讨[J]. 学术研究, 2009(2): 95-100.
- [5] 梅伟强, 张国雄. 五邑华侨华人史[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63.
- [6] 俞云平, 王付兵. 福建侨乡的社会变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8-12.
- [7] 蔡苏龙. 侨乡社会转型与华侨华人的推动: 以泉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72-76.
- [8] 赵和曼. 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206-230.
- [9] 张国雄. 侨乡文化与侨乡文化研究[J]. 五邑大学学报, 2015, 17(4): 1-7+90.
- [10] 李明欢.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363-364.
- [11] 李道平. 宁阳存牍[M]. 粤东省城印, 1899(光绪二十四年): 65.
- [12] 余启谋. (民国)开平县志[M]. 铅印本. 香港: 民声印书局, 1933(民国二十二年): 卷二·舆地志.
- [13] 张启琛. (宣统)开平乡土志[M]. 开平市华侨博物馆藏手抄本, 1909.
- [14] 肖文评, 夏远鸣, 王濯巾, 等. 《岭东日报·潮嘉新闻》梅州客家侨乡史料选编[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38.
- [15] (宣统)新宁乡土地理: 第二十一章: 第六十五课[A]. 台山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1-8-37.
- [16] 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 中国近现代移民史[M]. 李明欢, 译. 黄鸣奋, 校.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50.
- [17] 广东省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汕头市志: 卷六十九[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587-590.
- [18] 张国雄. 中国侨乡研究: 第二辑[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17.
- [19] 黄海娟, 张国雄. 台山一中历史文化论[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255.
- [20] 台山侨务局办公室. 台山县华侨志[M]. 内部刊本, 1992.
- [21] 广东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广东省志·华侨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22] 林颢廷. 再告广海自治体各职员(续二十四期)[J]. 新宁杂志, 1911(25): 6. 台山档案馆藏, 档案号: 1-7-7.
- [23]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 司徒美堂[M].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23.

[责任编辑 李夕菲]

ABSTRACTS

On the Periodization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Qiaoxiangs in China

(ZHANG Guo-xiong)

Abstract: Periodization of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academic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n qiaoxiangs, which is the basi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Up to the present, there has been little discussion on i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it urgently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depth. From the 1860s to the present, the qiaoxiang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formation,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matur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cultural forms: early mod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Key words: Qiaoxiangs; Guangdong; Periodization; Forms

From "An Area of Piracy" to "Trade Island"

(SHI Jian-ping)

Abstract: Shangchuan Island was historically a remote island, far away from the mainland and beyond civilization. With the penet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bout Shangchuan island and its surrounding water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depict a "Shangchuan impression" from "an area of piracy" to "an island of trade". They not only reflect the infilt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dynasties to the island border, but also the predicament and flexibility of the early Sino-Portuguese trade.

Key words: Shangchuan Island; Pirates; Sino-Portuguese trade; Francis Xavier

On Liang Qichao'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Doing without Giving a Thought to Rewards"

(ZHAO Nan)

Abstract: "Doing without giving a thought to rewards" is not only Liang Qichao's outlook on life, but also one of his core educational thoughts. "Doing" is driven by "emotion" and "interest". It is spontaneous and adaptabl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erene and free and therefore, it can transcend the doubts and worries that beset people, and can be profound and lasting and never get tired. This thought of Liang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enlightenment and nourish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represented by the Confucian study of the mind, the Western voluntarism and Bergson. It reflec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focus of life changes from possession to finding the way to achieve a complete life; second, the kinetic energy changes from the binding force of external norms to internal and spontaneous power; third, obsession with reason is transformed into a focus on the experience of life. Educators need to pour emotion and provide enjoyment, and art is a magic weapon to evoke emotion and jo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Doing without giving a thought to Rewards"; Education

On the Difficulties in Spreading and Accepting Liang Qichao's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DENG Wen-hua, CHEN Shi-ying)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Liang Qichao's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re limited in scope and ineffective.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irst, in the name of "dialectics", Liang Qichao's later educational thoughts were deliberately shrouded; second, they are "dismembered" in the name of "professionalism"; third, their ultra-utilitarianism conflicts with the utilitarianism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Liang Qichao's educational thoughts, we need to: first,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Liang Qichao's educational thoughts; second, eliminate several pairs of tensions; and third, create a goo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Liang Qichao; Educational ideology; Spreading; Acceptance

On Liang Qichao's Trans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his Early Days of Exile in Japan

(XU Ming)

Abstract: During Liang Qichao's early exile in Japan (1898-1903), among others, "Yoshida Jin", "Sad Guest", "the Juvenile of China", "the New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world-known "the Icerteria Owner" were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ones.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 of his thought, Liang Qichao's pen names were also changing, but his spirit remained constant. He had been adhering to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an intellectual trying to succor the world.

Key words: Liang Qichao; Pen names; Exile; Japan

The Mind Study and Practice of Zhan Ganquan

(LIU Xing-bang)

Abstract: Zhan Ganquan's theory of the mind contains a wealth of thoughts on practice, which manifests themselves as the unity of the study of the mind and dealing with practical affair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unity of "governing of the mind" and "governing of things". "Governing of the mind" aims at cultivating noble character and equipping people with lofty moral ideals. "Governing of affairs" means "promoting careers", enabling people to mak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making them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The study of mind of Zhan is practical learning that combines being a man with doing things.

Key words: Zhan Ganquan; Study of the mind; Study of practice; Governing of the mind; Governing of things

Cantonese Chen Bin's Policy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ea Frontiers of Fujian and Taiwan

(GONG Pan)

Abstract: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Chen Bin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Fujian and Taiwan for more than a dozen years and was very clean and capable. He was among the "three great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from the Lingnan region", the other two being